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ISSN 1000-2731,CN 61-1011/C

##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文明交往论”:从标识性概念到原创性理论  
作者: 韩志斌, 马丽萍  
DOI: 10.16152/j.cnki.xdxbsk.2025-06-010  
收稿日期: 2025-09-24  
网络首发日期: 2025-11-05  
引用格式: 韩志斌, 马丽萍. “文明交往论”:从标识性概念到原创性理论[J/OL].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6152/j.cnki.xdxbsk.2025-06-010>



**网络首发:** 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 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 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 “文明交往论”：从标识性概念到原创性理论

韩志斌,马丽萍

(西北大学 区域国别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彭树智教授及其团队提出的“文明交往论”揭示了不同文明间平等对话、互鉴共生的内在规律。该理论既是对 20 世纪末世界格局深刻变革的积极回应,也是对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文明叙事的有力纠偏。在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交往”观念的基础上,彭树智教授进一步提出“历史交往”这一核心概念,并通过对该概念横向维度的系统延展,确立了“文明交往”的理论内涵与“文明自觉”的基本内容。本文在系统梳理“文明交往论”的生成背景、发展阶段与理论内涵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其对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的启示意义,即区域国别学应在基础认知层面构建整体性研究框架,在理论层面强化系统性与学理深度,在实践层面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从而推动学科体系的持续拓展与创新。

**关键词:**文明交往论;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6152/j.cnki.xdxbsk.2025-06-010

## 一、引言与问题的提出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并把“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作为着力点<sup>[1]346</sup>。建构本土自主知识体系以建构标识性概念为出发点,标识性概念建构又以理解概念的构成要素和建构原则为基础,进而提出原创性理论。彭树智教授及其团队提出的“文明交往论”系统阐释了不同文明间平等对话、互鉴共生的历史规律。“文明交往论”历经从标识性概念到原创性理论的演进,构建了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正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姜锋教授所言:“在学理上,彭树智提出的‘文明交往论’和‘文明自觉论’,阐述了当代中国对国与国关系‘由对立、对抗走向合作与对话’的理想,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世界大同的理念。”<sup>[2]</sup>目前,国内学界已经从多维度对“文明交往论”进行研究:一是梳理该理论的生成历程和逻辑理路,剖析其核心内涵与学术价值;二是探讨其对理解中东冲突的指导原则,分析其理论特质与实践诉求;三是从生态史观视

收稿日期:2025-09-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2023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东史学通史(五卷本)”(23VLS027)。

角揭示其对环境史研究的启示等<sup>①</sup>。本文基于“文明交往论”的生成演进,总结其丰富内涵,探究其与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以期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以及人才培养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参考。

## 二、“文明交往论”的生成基础

不可否认,任何理论体系和知识结构都必须建立在特定概念的基础上,概念建构必须拥有相应的概念知识和建构原则。知识体系包括本土标识性概念和外来移植性概念两种类型。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以本土标识性概念作为出发点。从根本上说,标识性概念建构主要源于双重动力:一是现实需要的推动,二是社会科学知识特性的驱动<sup>[3]</sup>。作为本土标识性概念“文明交往论”的提出就是现实时代需求与学术知识特性驱动的结果。

第一,从时代背景来看,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革为“文明交往论”的提出提供了宏观知识背景。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意识形态对抗趋于缓和,文明差异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东亚经济体(日本、四小龙等)从经济增长模式、政企关系到文化价值观等多个层面的发展实践,对“现代化必然等同于西方化”的理论假设构成了实质性修正,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促使学术界重新审视本土文明的价值与特色。

第二,从学术脉络来看,文明史观为“文明交往论”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照。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虽然开创了文明研究的先河,但其线性进步史观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19世纪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 W. F. Hegel)提出的“绝对精神”发展理论,实际上构建了一套“文明等级论”体系<sup>[4]</sup>。20世纪上半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虽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却陷入了文明生命周期论的窠臼<sup>[5]</sup>。20世纪90年代,萨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虽然强调了文明差异的重要性,却片面夸大了文明间的对立性,忽视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事实与现实可能<sup>[6]</sup>。面对传统文明史研究的不足,“文明交往论”创造性地对上述观点进行回应,提出了“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sup>[7]3</sup>的观点。

第三,从学术源流来看,“文明交往论”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仅频繁使用“交往”这一概念,更系统性阐释了生产力与交往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明确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sup>[8]115</sup>,并将这一矛盾视为推动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文明交往论”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将“交往”界定为伴随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所形成的社会关系<sup>[7]461</sup>。该理论构建了包括经济交往、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社会交往乃至生态交往的完整体系,并总结了和平与暴力两大交往形式。这不仅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交往范畴,更赋予了其更强的文明解释力。

① 张倩红、刘洪洁《从文明交往到文明自觉——彭树智教授的文明交往史观》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第121-132页;彭树智、闫伟《从人类文明交往中探寻中东研究的学术自觉——彭树智教授访谈实录》载于《中东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3-22页;蒋真《从文明自觉的“三知之明”探析彭树智教授的文明观》载于《中东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30-39页;可晓丽《从历史交往、文明交往到文明自觉——彭树智教授的文明鸿踪论》载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2期,第120-123页;彭树智、韩志斌《从文明交往到文明自觉——访彭树智教授》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2期,第22-26页;巨永明《从“文明交往论”看中东冲突问题——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彭树智教授访谈录》载于《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3期,第7-8页;王瑞媛、王成军《文明自觉与历史自觉的统一——论彭树智教授文明交往史观的理论特质和实践价值》载于《中东研究》,2023年第2期,第42-54页;张宏宇、马丽萍《文明的生态交互与自觉:彭树智教授的生态史观》载于《中东研究》,2023年第2期,第12-27页;吴华、张瑞《交往·自觉·互鉴——彭树智教授文明观的逻辑理路》载于《中东研究》,2023年第2期,第306-307页。

### 三、“文明交往论”从标识性概念到原创性理论的演进

彭树智教授在对马克思与恩格斯“交往”概念的基础上,提炼出“历史交往”“文明交往”和“文明自觉”等标识性概念,提出了“文明交往论”这一原创性理论。“文明交往论”历经“历史交往论”—“文明交往论”—“文明自觉论”三阶段,体现了该理论从标识性概念到原创性理论的演进历程。

第一阶段:提出“历史交往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这是理论萌生期。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共同构成了历史交往的完整内涵,这一双向互动过程不仅塑造了各文明的独特面貌,更推动了全球历史的整体演进。

第一,认为“历史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sup>[9]</sup>。马克思与恩格斯不仅从生产关系、物质交往、精神交往三个维度对“交往”进行了横向剖析,还通过原始社会、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等宏观历史节点勾勒出人类交往形态的历史轨迹<sup>[8]115</sup>。彭教授立足于中东地区的历史变迁,开创性地提出了“历史交往”标识性概念,即“人类的交往是伴随着生产力同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因而是历史交往的过程”<sup>[7]3</sup>。因为“历史交往”这一过程,“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指中东)交汇,形成了文明交往的诸多独特性”<sup>[7]337</sup>。

第二,指出“历史交往”的四种方式。彭教授以古代塞人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塞人在中亚与南亚的历史活动轨迹。通过翔实的史料分析,揭示了塞人与周边文明“历史交往”的四种方式:即战争交往、土地争夺、政权建立以及文化与经济交流。正是通过这种交往活动,人类才得以突破地理隔绝,建立起整体性的文明联系<sup>[9]</sup>。在彭教授看来,各种交往方式都是历史合力的组成部分,影响具有多线程、非线性特征。

第三,丰富了“文明的十字路口”的概念。在《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sup>[10]</sup>一文中,彭教授从文明角度对丝绸之路学者“文明的十字路口”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性诠释。在彭教授看来,阿富汗作为古代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的独特地位,使阿富汗成为波斯—伊朗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四大文明体系的交汇点。彭教授还特别关注到,这种多文明交汇不仅促进了健陀罗艺术等新型艺术风格的形成,也推动了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跨区域传播<sup>[10]</sup>。这种历史交往不仅是文明互动的熔炉,也是文明创新的摇篮。

第四,梳理了历史交往和物质文明的关系。彭教授从物质文明传播的角度深化了相关研究,揭示了文明交往对全球文明发展的深远影响<sup>[11]</sup>。虽然物质生产因自然环境差异而呈现地域性特征,但正是通过文明交往,不同地区的物质文明成果得以传播,从而对全球文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历史交往成为了文明交往理解的重要视角。

第二阶段:强调“文明交往论”(2001年至2012年),这是理论建构期。在这一阶段,彭教授从“历史交往论”转为“文明交往论”,致力于“文明交往论”原创性理论的系统化建设。

第一,首次提出了以“文明交往”为标识性概念的历史研究范式。彭教授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构建了多维度的历史分析框架:在内容维度上,彭教授提出了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制度交往、生态交往的四维结构;在特征维度上,彭教授提炼出实践性、互动性、开放性、多样性、迁徙性五大基本属性;在要素维度上,彭教授系统阐述了主体与客体、科技与交通、民族与国家、地缘与环境、宗教与文化、语言与文字、利益与正义七对关键因素<sup>[12]</sup>。这些要素构成了“文明交往论”的理论内核。

第二,将研究视野从区域性交往拓展到全球文明交往互动。彭教授提出了“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这一核心命题,并且通过塞人篇、阿富汗篇、伊朗篇、中东地区篇、阿拉伯伊斯兰篇、世界史综合篇、当代世界篇七大专题研究系统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文明交往的内在规律<sup>[7]</sup>。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文明交往过程的动态理解,更建立起连接微观个案与宏观历史的理论桥梁。

第三,关注理论的构建,注重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与发展自己的理论。《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



往散论》以跨学科视野,通过具体案例分析,生动展现了不同文明在交往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及其历史影响。作为移民文化的代表,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从巴勒斯坦到美国的移民轨迹反映了二战后殖民地向原宗主国大规模人口流动的趋势。而赛义德在《东方学》等著作中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解构体现了被殖民知识精英对西方中心主义知识体系的反思与挑战<sup>[13]64-71</sup>。换言之,文明交往的过程为文明交往创造了新的主体条件,而新主体的产生动摇了殖民时代形成的话语霸权,推动文明交往向更多元、平等的方向发展。而《书路鸿踪录》不仅收录了彭教授的重要史学研究成果,还记录了彭教授的教育实践心得,充分体现了彭教授“知行合一”的学术理念。回溯教授的学术生涯,其在求学阶段便体悟了“爱”“好”“乐”的读书三境界。这种以学术为乐的态度为日后以学术为业的历史教学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后几十载的教育实践中,彭教授积极践行这种以学术为乐的培养理念,注重发掘学生的学术兴趣与研究潜力,帮助其建立了长期性的专业研究方向<sup>[14]8</sup>。

总之,“文明交往论”已从本土标识性概念,升华为贯穿彭教授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原创性理论,既是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深刻总结,也是彭教授学术思想成熟的标志。

第三阶段:推进“文明自觉论”(2012年至今)。文明自觉论可称之为文明交往自觉论,文明自觉是以文化思想自觉为核心、以文明交往自觉活动为主线的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是“文明交往论”这一原创性理论的系统深化。具体包括如下内容<sup>[15]</sup>:

一个中轴律:人类文明交往互动规律。认识和把握交往互动律的自觉性表现为在深刻的矛盾对立中把握文明交往互动,把对抗、冲突和共处、同进统一于历史选择的相融点上,使之在这个中轴律上自觉运转。

两类经纬线:人类文明交往互动的经线为相同文明之内的相互融合,纬线为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人类文明交往互动的内外关系促使研究者在普遍联系中确立用以把握世界历史的理论体系,回答全球文明化的整体性、联系性、依存性与制约性问题,从而获得自觉。

三角形主题:人类文明交往互动围绕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身心这三大主题的三角形路线进行。三角形的底线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互动,两边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身心之间的交往互动。

四边形层面:人类文明交往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这四个主要层面。人类历史虽然像自然一样运行,其实质都服从交往互动规律,只不过是人类有自觉的意识在起作用,而这正是文明自觉最关键之处。

五种社会文明交往形态,即人类文明交往史上有五种社会交往形态: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对社会性考察越细致入微,也就可以从中全面认识文明交往的具体特征,从而取得史学本体的进步和获得学术的自觉。

六条交往力网络:人类文明交往的驱动力是与生产力相互伴随的交往力,二者又是历史传统的积累和现实体躯的创造力。交往力既见之于物质,也体现于精神。这六条交往力是:精神觉醒力、思想启蒙力、信仰穿透力、经贸沟通力、政治权制力、科技推进力。这六种交往力所互动的合力形成了人类文明交往自觉的壮丽风采和恢宏气象。

七对交往概念:即传承与传播、善择与择善、了解与理解、对话与对抗、冲突与和解、包容与排斥、适度与极端。了解与理解是不同的递进阶段,而尊重对方是关键;对话与对抗、冲突与和解、包容与排斥之间,都有对立与转化联系;适度是文明交往自觉性的尺度,而极端为文明交往所应预防的危险倾向。

八项变化:人类文明交往是变动化的实践活动。其要义有八:教化、涵化、内化、外化、同化、转化、异化、人化。所有这八项变化是因文明自觉程度而决定其深化程度。

九何而问:人类文明交往的自觉在于问题意识的引导,它引导人们自觉地发现、提出、分析问题。这些问题可归纳为“九何”: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何果?何类?何向?何为?

彭教授还创造性地提出“自知之明、知人之明、知物之明、文明自觉、全球文明”<sup>[16]2</sup>的认知框架。其中,“自知之明”强调文明主体对自身文化特质的深刻认知,这种认知构成了文明交往的起点<sup>[17]86</sup>;“知人之明”着眼于对他者文明的理解与尊重,构成了文明对话的前提<sup>[18]3-102</sup>;“知物之明”关注对客观物质环境的把握,为文明交往提供现实基础<sup>[18]237-341</sup>;“文明自觉”是文明主体的自我意识觉醒,是“人类文明交往实践的产物”<sup>[18]440-481</sup>;“全球文明”则超越了“文明冲突论”的单向思维,确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愿景,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往提供了规范框架<sup>[14]844[19]560-561</sup>。

在学术实践层面,《我的文明观》通过宏阔的历史视野,对古今中外的文明交往活动进行了系统性的跨文明比较研究。一方面,彭教授通过对唐代长安与波斯祆教文明交往等典型案例的剖析,揭示了前现代时期跨文明互动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彭教授立足于全球化语境,深入探讨了当代中东文明与其他区域文明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文化适应与冲突问题<sup>[20]</sup>。而《老学日历》集中体现了彭教授治学过程中的理论思考与学术心得。在彭教授的学习观中,“学习”是学的自觉意识,“学问”是把学习与学问统一的问题意识,“学思”是学习的理论思维意识<sup>[21]2-3</sup>。基于这一成熟的理论体系,彭教授先后主持修订和编撰了多部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史学著作,尤其是《中东史》<sup>[22]</sup>,不仅是“文明交往论”的具体实践,也是中东研究领域重要的学术参照。

#### 四、“文明交往论”的理论内涵

“文明交往论”创造性地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辩证思想,斯宾格勒与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文明形态史观,吴于廑教授的整体世界史观。其理论体系内涵有五。

(1)“文明交往论”解释了人类文明互动的本质属性与历史意义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实践,发展生产力与交往活动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生产力体现为人类改造自然、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实践能力,而交往则表现为不同群体或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二者辩证统一,即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为文明交往奠定物质基础,而以文明交往为代表的社会交往又为生产实践提供必要条件<sup>[20]6</sup>。在多样的交往活动中,文明交往因其非物质性特征发挥着独特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文明交往能够将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发展动力,促进技术、知识与经验的代际传承与创新扩散,使个别文明成果最终成为人类的共享财富<sup>[20]4</sup>。其二,从历史维度来看,文明交往不仅持续推动着交往内容与形式的自我更新,而且通过强化跨文明的社会联系,不断突破地理空间与区域壁垒的限制。最终,文明交往引领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sup>[17]7-8</sup>。

(2)“文明交往论”阐述了文明交往的多层次性 文明交往的内容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与生态文明<sup>[17]6</sup>。物质文明是文明交往的基础,为人类交往提供了物质内容与交流载体,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群体因自然环境等条件的差异,占有的生产工具与生活资料存在差异,而文明交往正是弥补这种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关键途径<sup>[12]</sup>;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核心维度,体现了不同文明的价值观念、伦理体系与思想体系,其跨时空限制的特点为人类交往活动提供了精神指引与伦理准则<sup>[12]</sup>;制度文明是人类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规则化、系统化的组织方式,既是文明演进的内在产物,又影响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模式与互动机制<sup>[12]</sup>;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文明交往要求人对自然的态度从盲目索取转向自然协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sup>[18]242,246-248</sup>。这四个层面并非孤立隔绝的,而是相互渗透的。

(3)“文明交往论”揭示了文明交往的普遍性与必然性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到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共存的古代社会,再到现代民族国家时代,文明交往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自人猿揖别、文明曙光初现之时,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就不断推动着制度进步、技术发

展、思想嬗变。如,奥斯曼帝国汲取了波斯、拜占庭的统治智慧,构建起横跨三大洲的帝国治理体系;源自中国的造纸术经由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为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与科学革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古希腊学者在游历埃及与两河流域的过程中吸收了当地数学与天文学成果,推动了西方理性思维的兴起。而文明交往的必然性则是人类对生存与发展最优解的永恒追求。彭教授总结道,历史一再证明:“共处共存、共发共融是文明交往的主流”<sup>[17]423</sup>。

(4)“文明交往论”指出了文明交往的多样性与互动性。文明交往涵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与生态文明四个维度,内容丰富多样。由于不同文明在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主体间的异质性与交往内容的多维性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人类文明交往的多样途径。尽管文明交往过程中的互动往往带有不对称性,即强势文明通常会在交往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文明交往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出与强制同化,而是一个双向相互借鉴的动态调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明通过持续对话与交流,实现自我更新与共同发展<sup>[7]13</sup>。

(5)“文明交往论”总结了文明交往流变的阶段性特征。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文明交往的进程并非线性或者匀速推进,而是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彭教授认为,从宏观视角来看,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早期人类社会以分散的原始公社形式存在,社会交往局限于狭小的血缘群体与部落联盟,文明互动极为有限;农业革命之后,人类开始形成密集的聚落,区域内的贸易、战争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为更大范围内的文明交流奠定了基础;随着生产力提升与国家形成,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早期帝国相继出现,文明交往在特定地理单元内达到鼎盛;通过军事征服与行政整合,帝国疆域突破原有的地理界限,形成了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文明交流网络;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塑造了更具包容性的世界性帝国,丝绸之路等跨大陆贸易通道的兴起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深度互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欧洲国家通过海洋贸易与殖民扩张逐步建立起全球性控制体系,人类文明交往由此进入全球化时代<sup>[7]19-20</sup>。

## 五、结 语

“文明交往论”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是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重要内容,他与区域国别学的基本特征、研究主题、目标任务高度契合。文明交往论对于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意义在于他重视人类各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在于他关注这种联系和影响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中所达到的程度和发挥的作用。

概言之,以“文明交往论”建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包含以下三个维度。

一是建构基础认知层面的整体性研究,构成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研究者对目标国家或地区进行全方位考察,形成系统、客观、真实的知识谱系,其核心特征体现为全域覆盖、学科协同和长期深耕。这种整体性认知的形成本质上有赖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唯有打破学科壁垒,才能综合解析不同文明之间的多维互动。彭树智教授的学术实践印证了这一研究路径的可行性,在《阿拉伯国家史》《中东国家通史(13卷)》《二十世纪中东史》《中东史》《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等一系列史论结合的专门史、区域史和通史性著作中,以“文明交往论”为阐释框架,分析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历史个案,这对于提升我国西亚北非问题研究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奠基作用,推动本土知识体系在事实描述基础上的范式创新,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

二是建构理论阐释层面的学理性研究,构成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研究者在把握了目标国家或地区的基本整体性认知基础上,通过理性思考或逻辑思辨而得出的具有一般规律性的理论。建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具有原创性、自主性的理论知识生产。为此,研究者必须做好“破”和“立”两件事,即破除和摆脱西方中心论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主导地位,建立具有



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彭树智教授的“文明交往论”就是基于文明研究,又鲜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研究论调的自主创新,是对西方渲染的“文明中心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的突破和修正。“文明交往论”立足不同文明主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汇,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往及其自觉进行阐释,确立以文明自觉引领知识生产的中国立场和中国理论,通过思想文化自觉重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三是建构问题导向层面的应用性研究,构成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效能。研究者将整体性和学理性研究进一步深化为符合且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应用性研究,其知识生产需具备学以致用、问题导向和知识转化三个基本特征。无论是欧洲以文明范式为核心的区域国别学、美国以现代化叙事为特征的区域国别学,还是中国立足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区域国别学,其学科生成与体系建构的底层逻辑都是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响应。换言之,国家战略需求的实践赋能,始终贯穿中西方区域国别学发展史的全过程,并塑造着其目标定位。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世界影响力持续扩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一带一路”、落实“三大全球倡议”、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战略都对高质量区域国别人才提出大量需求,也对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出时代命题。回顾彭树智教授的学术路,不难发现,他每一次学术生长点的转型都暗合时代需求,从20世纪50年代亚非拉独立浪潮背景下的印度史和民族解放运动史研究,到“文革”背景下国际共运史研究的转向,再到全球化时代文明交往论的提出与升华,都充分展现出中国学者自主的问题意识、时代意识和自觉意识。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语境下,主体性自觉意识是文明交往得以有序展开的前提,而人类文明交往自觉的本质是人的自觉。基于这一自觉,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树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自觉意识,突破既有研究范式的局限,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研究新范式:既要立足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传承创新与交流互鉴的全球文明倡议,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尊重不同国家独特的文化历史和发展道路;也要始终坚守中国立场,在深入研究世界各国、各区域的基础上构建兼具本土视角与全球视野的知识体系,提出标示性概念,涵养原创性理论,最终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实现文明交往与知识建构的双向赋能。

作为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新理论,“文明交往论”突破了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以文明互动、融合与共生的新视角,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西北大学在推进区域国别学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地处古丝绸之路关键节点的地缘优势和长期积累的学科特色,以“文明交往论”为理论指导,重点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关键国家和地区,通过打破学科壁垒的整合研究、深入实地的田野调查和立足需求的智库服务,构建了学术研究与现实应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面向未来,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建设需要在三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深化“文明交往论”的理论内涵,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二是创新研究方法,形成融合历史纵深与现实关怀的方法论体系;三是加强国际学术对话,提升中国在全球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话语权,为推动文明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 姜锋. 浅论区域国别学的功能与建设路径[J]. 国际观察,2024(4):133-156.
- [3] 郭忠华. 政治概念移植的现实基础和形变模式[J]. 政治学研究,2023(5):179-192,211-212.
- [4]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5]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M]. 齐世荣,等译. 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



- [6]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 刘绯, 张立平, 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 [7] 彭树智. 文明交往论[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 [8] 马克思与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9] 彭树智. 一个游牧民族的兴亡——古代塞人在中亚和南亚的历史交往[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1): 44-52.
- [10] 彭树智. 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J]. 历史研究, 1994(2): 133-149.
- [11] 彭树智. 伊朗与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西传[J]. 中东研究, 1994(2): 1-6.
- [12] 彭树智. 论人类的文明交往[J]. 史学理论研究, 2001(1): 5-18, 159.
- [13] 彭树智. 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4.
- [14] 彭树智. 书路鸿踪录[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4.
- [15] 韩志斌. 从文明交往到文明自觉——彭树智教授访谈录[J]. 历史教学问题, 2009(2): 26.
- [16] 彭树智. 京隐述作集: 史以明道(第二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17] 彭树智. 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22.
- [18] 彭树智. 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 第一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19] 彭树智. 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 第二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20] 彭树智. 我的文明观[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3.
- [21] 彭树智. 老学日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22] 彭树智. 中东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责任编辑 樊丹丹]

## “The Theory of Civilized Interaction”: From a Signature Concept to an Original Theory

HAN Zhi-bin, MA Li-ping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 Institut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Peng Shuzhi and his team's theory of “Civilizational Interaction” reveals the inherent patterns of equal dialogue, mutual learning, and symbiotic coexistence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This theory not only serves as a proactive response to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in the global landscape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but also acts as a powerful corrective to Western-centric civilizational narratives. Building on and further developing the Marxist concept of “interaction,” Professor Peng Shuzhi introduced the core notion of “historical interaction.” By systematically expanding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s of this concept, he establish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ivilizational interaction” and the foundational elements of “civilizational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genesis, developmental stages, an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theory of civilizational interaction,”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ea Studies. It argues that Area Studies should, at the foundational cognitive level,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research framework;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enhance systematic rigor and academic depth; and at the practical level, maintain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Such efforts will propel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discipline's architecture.

**Key words:** Theory of Civilizational Interactions;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Distinctive Concept; Original Theory